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編

1

新文艺出版社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

第 一 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編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

第一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編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72

开本787×1092 耗1/25 印張8 16/25 字数168,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定价(7)0.75元

写在前面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輯，经过短促的筹备，现在和讀者見面了！

出版这个丛刊，是为了开辟一个发表文学研究成果的园地，以推动上海的文学研究工作。上海虽有几个文学刊物，但对象不同，性质不同，专门发表文学理论研究的地方还是比较缺乏。有了这个丛刊，比较长一点的评论文章就有了较多的及时和讀者見面的机会。

我們的方針是：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問題，阐述和宣傳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坚决地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創作傾向作斗争。一面澆花，一面鋤草，一面修枝剪叶，一面培土施肥，积极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在方法上，我們提倡用辯証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問題，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

我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欢迎有創造性的新見解，提倡敢想、敢講、敢批評、敢爭論的风气，反对厚古薄今，頌古非今，迷信古典作家的傾向。

这一輯的内容，就是按照上面的方針来安排的。重点放在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上。自然，它距离我們所希望的目标还很远，缺少对新創作的評論，尤其是一个大缺点。但我們决心先干起来，“边干边学”，“边做边改”，希望逐步地使質量提高。希望作者和讀者們热烈地支持我們。

这个“丛刊”誕生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高潮中，所以定名“跃进

文学研究丛刊”。今后,准备每三个月出一辑,字数不限。如有来稿,請寄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轉交。

目 次

写在前面	(1)
------------	-------

关于杂文	張春桥 (1)
------------	-----------

論作家的思想武装	以 群 (17)
----------------	------------

“艺术即政治”批判	罗 蓀 (48)
-----------------	------------

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論	姚文元 (70)
-----------------	------------

論叶紹鈞的“倪煥之”	陈尙哲 (108)
------------------	-------------

从“文”和“文学”的含义說明	
----------------	--

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	郭紹虞 (132)
---------------------	-------------

水滸人物的英雄形象	李希凡 (148)
-----------------	-------------

——“論水滸”之二

論法国作家(耿峰譯)	法捷耶夫 (183)
------------------	--------------

关于现实主义的几个問題	蔣孔阳 (197)
-------------------	-------------

——評“现实主义問題討論集”

关于杂文

張春桥

一 两种杂文

关于我們这个时代的杂文問題，总是一个吸引人的題目，这不是偶然的。

我們說，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某种征兆，而杂文表现得最为突出。

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曾經这样論述过杂文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續的写过許多論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給他起了一个綽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为蚊子蒼蝇討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証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論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們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的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①

这段话，是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这里说的杂感、“社会论文”、“阜利通”，同现在说的杂文、文艺性政论、小品文是一个东西。二十五年来事实，证明了瞿秋白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每逢社会斗争有了急剧的剧烈的变化，使作家们不能从容地把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的时候，杂文就成了他们“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的武器，特别是用来进行对敌斗争的武器。所以，人们把杂文叫作匕首、短剑、投枪。但是，也正如同别的武器一样，无产阶级使用它，资产阶级也使用它。在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杂文总是双方“短兵相接”的武器。“文艺报”最近出版了一期“再批判”专辑^②，“再批判”的对象，头一篇就是王实味的反党杂文“野百合花”。丁玲不愧是反党集团的主帅，她的花样要多一些：写了反党的小说“在医院中”，又写了“三八节有感”之类的杂文。萧军、罗烽、艾青等人，大概也来不及“从容”地把反党的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小说和诗里去，写的也是杂文。罗烽并且打着“如今还是杂文时代”的旗子，号召人们把杂文这种“短剑”向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刺去。重读这些杂文，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二年，正当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又特别起劲的时候，丁玲、王实味等人，向党、向人民大举进攻，是多么急切，而他们选中的武器是杂文。至于说到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急切地拿起来的武器，又是杂文。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锺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杂文，王若望写的是杂文，徐懋庸更是接二连三地写了几百篇杂文。连一些素来不写文章的右派分子，也写了许多杂文。当然，我们的人也写了很多杂文，在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多少年的事实证明，杂文是敌我双方都喜欢采用的武器。

① “瞿秋白文集”，第九七八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 “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

正因为敌我双方都使用它，而丁玲、王实味等人，又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写反共产党的文章，在他们的真面目没有被揭露以前，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杂文是不是总是片面的呢？是不是既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又可以用来批评自己呢？发出这种疑问，虽然各个人用意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是为了使杂文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的。徐懋庸却别有用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间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这篇阴险的文章，说什么小品文即杂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遇到了“消亡的危机”。照徐懋庸看来，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据说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的杂文，就难以存在了，因为新社会是“民主的”。但是，明眼人只要看一看他所列举的“七大矛盾”，就不难发现，在徐懋庸的眼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社会“不民主”，或者如另一个右派分子曾彦修所解释的，徐懋庸的意思是说：新社会“言论不自由”，他们的证据就是这个社会容不下“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杂文。因此，他们实际上仍然在重复着罗烽的口号：“如今还是杂文时代”，或者如另一个右派分子洛雨所号召的“堂鼓呀归来”，总之，把他们的话翻译成通暢的文字，这就是：只有打倒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小品文即杂文的“危机”。

经过反右派斗争，揭穿了这些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以后，我们当然比较容易地懂得了这条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同从前一样，不光是革命者写了革命的杂文，还有反动分子写的反动杂文。资产阶级右派写的是一种反动的杂文，如同蚊子苍蝇一样，是应当“消亡”，必须“消亡”的。他们所热烈希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代表两种力量的两种杂文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杂文现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奇文共欣赏”，毒草变肥料。我们的杂文却不但没有发生什么“消亡的危机”，反而空前繁荣起来。打开我们的报纸刊物，哪一天我们看不到大量的杂文呢？

二 矛盾出杂文

我們的杂文,不但目前不会“消亡”,将来也不会“消亡”。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給整个文学艺术,也給杂文开辟了空前丰富的源泉。

沒有誰給杂文下过定义,也不需要下定义。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按瞿秋白同志的分析,杂文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有两个。現在,“殘酷的强暴的压力”,在新社会,对革命作家來說,是不存在了;但是,社会斗争的发展是那样急遽、那样剧烈,以至象魯迅那样有修养的偉大作家,都不能从容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中去,表現在具体的形象典型里,这种情况,在今天和以后,仍然存在。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大跃进,这难道会是一个短时期的現象嗎?当然不是。我們的作家为了更直接更迅速地揭露和克服社会矛盾,为了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但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也需要杂文这种形式,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嗎?

矛盾出杂文。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間;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間。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則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这种情况,对于我們的作家來說,提出了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我們的文学艺术,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許多方面,接触得还很不广泛、很不深刻。生活的許多領域,不但其他的艺术形式,就是杂文这种輕騎兵,也还没有探索过。不是杂文的题材太少,而是很多題材我們还

沒有碰過。

我們面前有敵我矛盾。在國內，我國人民同舊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我們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的右派分子的矛盾，也是敵我矛盾。對於解決敵我矛盾，我們的索文曾經沖鋒陷陣，作過出色的貢獻。在今後，我們仍然不應當忽略這方面的鬥爭。有的人認為“魯迅筆法”可以休矣，這是不對的。一方面，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才是“魯迅筆法”的全部精神，不應當把“魯迅筆法”單單了解作對敵鬥爭的精神；另一方面，即便單從對敵鬥爭這方面來說，既然敵我矛盾還存在，我們就沒有理由放棄這方面的鬥爭，我們不能“休矣！”不但國際範圍內，有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勢力；在國內，也還有反革命殘余，雖然不多了；由於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包含一部分敵我矛盾，即我們和右派之間的鬥爭，而階級關係又時而尖銳（例如當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時而緩和（例如當反右派鬥爭取得勝利，階級敵人被迫退卻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經常保持警惕，不注意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們就要犯錯誤。在這方面，我們並不是沒有教訓的。當着資產階級右派發動進攻，階級關係尖銳化起來的時候，我們有些人把這種敵我矛盾也看作了人民內部的矛盾，不去堅決粉碎這種進攻，犯了右傾的錯誤。這不是剛剛過去不久的事情嗎？

但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大量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就以文藝戰線的情況來說，文藝工作者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中間的少數是右派，多數是中間派。這些中間派，對於所有制的改變、對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並不完全心服。他們對於為工農兵服務，還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有真有假。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王國。但是，一般說來，他們還是傾向於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接受社會主義道路的，他們同無產階級的矛盾一般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經過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這方面繼續向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方向變化。因此，我們應當信任他們中間的多數，幫助他們進行徹底的改

造，使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資本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中間動搖不定的兩面性，爭取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逐步從中間派轉入左派，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當然是一個長時期的、曲折的過程。

我們還必須看到：我們人民內部的矛盾並不一概屬於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同志的報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於這個問題曾經作過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人民內部的矛盾除了存在於一般的資產階級分子同勞動人民之間以外，還更廣泛地存在於勞動人民內部和無產階級內部。無產階級內部的矛盾，一部分是由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傳染到無產階級中的許多人而產生的。我們整風中要着重反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要着重批判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却是由於人們的主觀認識不符合於客觀實際，人們的領導落後於群眾的需要產生的。這是一種主觀同客觀、先進同落後的矛盾。我們在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運動中，所着重解決的，就是這種先進和落後的矛盾。對於這種矛盾，就不能看作是階級矛盾，更不必說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了。這類矛盾，就是在階級和階級影響消滅以後，在社會主義社會完全鞏固、以至往後億萬斯年的共產主義社會，也仍然會繼續存在。那時，生產關係的發展到了一定時期仍然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的發展到了一定時期仍然會落後於經濟基礎的發展，而人類社會也就將在不斷地克服這類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矛盾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

我所以從黨的文件上摘引這些對當前國內矛盾的分析，主要是想說明：我們所面臨的生活是異常豐富多樣的，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還沒有來得及反映這麼錯綜複雜的矛盾。如果說我們對描寫敵我矛盾有比

較多的經驗，但是，描写处理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之間这种敌我矛盾却仍然是經驗很少的。至于如何正确地表現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別是正确地表現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更是一个新的任务。党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正是我們正确地認識生活、解决这个新任务的指南。虽然它不能代替作家自己对矛盾的深刻观察和艺术上的創造性劳动。

三 促進派的杂文

当然，我們也不能說，我們一点經驗也沒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只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过去的各个革命时期同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何表現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在过去就存在。一般文学作品如此，杂文也如此。

首先必須分清敌我，分清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远在十五年前，王实味、蕭軍、罗烽等人，从他們的反动立場出发，借口“太阳里面也有黑点”，假借所謂“魯迅笔法”，用阴險手段鼓动作家把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用当年魯迅攻击敌人的那种“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来攻击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当时，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給了这种反动的思想以严厉的批判，教导作家們必須分清敌我。毛澤东同志說：

魯迅处在黑暗势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諷的杂文形式作战，魯迅是完全正确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一样。我們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

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①

要分辨清楚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在一般情況下，在矛盾已經暴露得十分明顯的時候，我們的同志是可以分清敵我的。但是，當着形勢比較複雜或階級關係發生比較急劇的變化的時候，許多人就不易看清。一九五七年春天，資產階級猖狂進攻已經開始的時候，有政治經驗的同志很敏銳地看出了這種矛盾的性質；那些在實際生活的風浪中鍛煉出來的老工人，也感覺到了這是向社會主義的進攻；而我們有些“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却塞了鼻子，聞不出其中的反動氣味。當着這場鬥爭到达了高潮，我們有些同志卻又忘記了國內的基本政治形勢，把人民內部的某些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習慣、不滿意，也一概看作敵我矛盾。我們有些寫雜文的同志，在這個過程中，也犯了不少錯誤。正是這一場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鍛煉了我們，使我們懂得了很多過去不懂得的事情，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對國內的基本政治形勢，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政治是統帥，政治是靈魂，一切事業是這樣，雜文更是這樣。作各種工作都要懂得大局，懂得政治形勢，做文學藝術工作，也必須懂得大局，懂得政治形勢，寫雜文的人，更是如此。

黨教導我們：對於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的方法也就不同於敵我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壓服的方法。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就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用這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九四頁。

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服务，为遵循着党的多快好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我们的杂文当然也必须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服务的。它应当是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杂文，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的杂文，也就是促进派的杂文。这是我们的杂文的基本性质。我们看到：许多同志写出了很多出色的杂文，坚决勇敢，又有说服力。但是，也有许多杂文，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还敢于上阵；对资产阶级“名人”、“权威人士”，就不大敢动了，更不要说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了。这是我们在今后必须解决的。

我们的杂文，当然也要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方面，许多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也有不少文章写得不对头。这里说的不是右派分子的文章，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说的是一些政治上好人、思想上问题很多的人写的文章。当他们的文章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们或者不心服，或者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举例来说：

“杂文就是讲缺点的。”本来，杂文只是一种文体，它同别的文体一样，既可以讲成绩，也可以讲缺点。能够说诗是专门歌颂的吗？那末，讽刺诗算不算诗呢？生活在我們这个时代，人民的英雄创造一点儿也打不动他的心弦，满眼都是缺点，这该是什么人呢？一个作家，要作政治上的革命派，要作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他就不能不考虑怎样做才能促进革命，怎样才能鼓起全民的大干劲，使人们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写杂文，如同做别的工作一样，是不能离开这条原则的。事实上，就是鲁迅也并不是不歌颂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杂文，难道不是一篇烈士的颂歌吗？苏联的一位著名的政论家萨斯拉夫斯基，他是写国际问题的杂文著名的，但是他同时也写了很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出色的杂文。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杂文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天地中

間呢？我們从报刊上看到，有些同志写的杂文，比如在爱倫堡的出色的政論中，歌頌人民的成就同对敌人的揭露，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正确地批評缺点，同样可以促进我們的事業。我并不主張杂文变成单一的、不講我們实际存在的各种缺点的文体。我只是反对把杂文看作只能用来講缺点的文体。如果真是分配你这样一个任务：一天到晚不准歌頌、只准講缺点，我看，那才叫活受罪呢。在我們这个时代，杂文应当更加多样化。不但可以講缺点，也可以歌頌。不但可以写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也可以写經濟問題。魯迅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領域，有待我們今天的作家努力，使它不至成为空白。

“講缺点，就不能要求全面。”用杂文这种形式，对于我們人民内部的缺点，进行尖銳的批評，自然是可以的。我們的党从来是鼓励人們批評缺点的。但是，为什么一說到缺点，就不能要求全面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对什么叫全面有一种不正确的了解。有一种論調，好象全面就是先說成績是主要的，后說缺点是次要的。于是，他們就問：短短的一篇小文章，怎么能够說得清楚？說清楚了，文章也“四平八穩”，沒有意思了。实际上，要求全面，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一切方面，比如你仔細地看了两只手的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是缺点，你写文章的时候，虽然並沒有預先声明，你說的只是一个指头的問題，但是，由于你是从全面看問題的，你对問題的提法、闡明問題的角度、分析問題的态度、批評的分寸、用語、口气等等，都会使讀者懂得你說的是一个指头的問題，你並沒有否定成績是主要的，你並沒有說十个指头都烂掉了。現在所以发生問題，并不是因为杂文批評了缺点，而是在进行这种批評的时候，作者並沒有对提出的問題作全面地分析。只看了一個指头，而这个指头恰巧是缺点，又沒有看看十个指头是不是都是缺点，以一代十，大发議論，說是缺点多得很，两只手要烂了，这怎样能够不片面呢？有人說：这叫做“有感而发”，也叫做“杂感”，杂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不然就不成其为杂文了。好

象片面性是杂文的同义語。这个看法,我是不贊成的。片面性的杂文,用来攻敌人,沒有力量;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起促进作用。杂文虽然不是科学論文,也不是党的文件,但是,它是政論,它是人民手中的工具,作家在“有感而发”的时候,总不能只考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兴趣,而根本不考虑这个“感”发了以后,到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事实上,一切促进派的作家,即便他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一心一意维护人民利益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他也要反复地考虑怎样写才对人民有利。因为即便是从促进的愿望出发,要想不发生看問題片面的錯誤,要想在任何問題上都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并不容易。对我们很多人來說,这种錯誤是难免的。但是,要求作家逐步地学会用辯証法看問題,要求作家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这不但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也只有学会了用辯証法看問題,作家才可能写出对人民的事业真正有促进作用的杂文。正如杂文不能同片面性划等号一样,辯証法总是同新生事物一同前进的,它同“四平八穩”也不能划等号。相反,它反对四平八穩,它不能容忍事物的停滞不前。正是学会了辯証法的人才能够科学地发现和矛盾运动的尖銳問題。我們还记得:当着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突飞猛进,打破了旧的平衡,出現了不平衡的时候,不是有人說这是“冒进”了嗎?好像是很“尖銳”地看到了一个大問題,但是,辯証法認為: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新的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循环不已,这是事物运动的規律。因此,不能反“冒进”,只能从打破旧的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遵循这个規律,才能够促进我們的事业大跃进。反“冒进”实际上是反跃进,是促退,不是促进。可見,想着用片面性来造成杂文的“尖銳”,实际上不但使杂文遭到“危机”,而且使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吃亏。只有辯証法,可以帮助我們观察矛盾运动,可以使我們看出反“冒进”是錯誤的,写出生动尖銳的杂文,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馬克思主义的政論家在这方面給我們树立了模範,可惜,我們还没有認真地向他們学习。